

追寻党校初心：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探源

□ 马晓敏 叶锦莲



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旧址

习近平总书记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指出：“回顾历史，党校始终不变的初心就是为党育才、为党献策。”“为党育才、为党献策”从根本上回答了党校因何而生、缘何而兴问题，是对党校因党而立、因党而兴、因党而强规律认识的深化，为推动新时代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。1933年3月，中共中央局在江西瑞金苏区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，这是中央党校的前身。中央党校自创办以来，为培养党的干部、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、服务党和人民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。一部校史就是一部为党育才、为党献策的奋斗史、发展史。

培养无限忠诚于党、忠诚于工农大众的干部

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创办后，紧紧围绕党中央“有计划、有目的地去进行大批干部的训练”战略部署，为革命事业培养了许多对党忠诚可靠、实践本领过硬、管理能力卓越的领导骨干。

培养对党忠诚的坚定战士。学校自创办之日起，便将培养无限忠诚于党、忠诚于工农大众的干部作为办学宗旨之一。重视理论学习。课程内容涵盖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、党的建设、苏维埃建设、工人运动、政治常识、军事等，同时学习中共党史、党的六大文件和共产国际文件以及文化知识，引导学员从理论上认清中国革命规律。紧密结合实际。毛泽东、张闻天、陈云等人经常到学校授课，结合中国革命实际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。毛泽东讲授苏维埃运动史时，针对中国“红旗到底打得多久”的问题，带领大家深入分析国情，并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深刻揭示红色政权存在的必然性和长期性，坚定了学员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心。加强党性淬炼。教育引导学员提高政治觉悟，锻炼思想意识，清除旧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，始终听党话、跟党走，为彻底粉碎国民党反革命“围剿”作出贡献。

通过系统学习，许多学员从对革命理论一知半解，逐步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。

培养善于斗争的革命先锋。学校为适应保卫苏区和反“围剿”斗争的需要，把培养学员的斗争精神和战斗力作为主要内容。注重学战结合。朱德、刘伯承、项英等人亲授军事课程，结合苏区反“围剿”作战的经验，系统阐述战略持久和战役速决的辩证法则、灵活机动的作战理念，生动讲解“十六字诀”游击战术原则及其成功运用。强化学练结合。日常训练涵盖打靶、射击、投弹、野外演习等实战技能，使学员既掌握作战技术，又淬炼出服从命令、纪律严明的作风。突出实践锻炼。教学不拘泥于课堂，学习期间均安排学员到苏区各地参加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，以提高实际工作能力，让学员学到了“活生生的马列主义”。这种军事化教育与实践化育人的培养模式，使学员兼具理论素养与实战能力，实现了革命理论向斗争实践的有效转化，为革命斗争输送了一大批既能运筹帷幄又能冲锋陷阵的先锋战士。

培养政权建设的管理骨干。学校紧扣苏维埃政权建设需求，把培养工农干部特别是县、区级干部作为紧迫任务。分级分类训练干部。学校设置新苏区工作人员训练班、党政工团干部训练班和高级干部训练班。高级干部训练班主要训练各省委、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工委会派送的高级干部，学制半年，是我们党系统化、正规化培养工农干部的重要尝试。量身定制训练课程。学校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制

定教学计划，开设了“游击战争”“党的建设”“苏维埃政权建设”“根据地经济建设”等课程，突出革命战争领导、政权建设管理、群众工作方法等履职能力培养。创新教学方式方法。学校经常举办学术讲演和形势报告会，董必武、张闻天等人以“巴黎公社”“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现在与未来”等专题讲座为载体，结合国内外革命形势，深入分析苏区面临的实际问题，帮助学员提升战略思维、增强全局意识。学校的大部分学员后来成为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中坚力量，如高级班学员刘俊秀、李坚真毕业后，分别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、中共中央局妇女部部长。

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发挥重要作用

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不仅注重提高学员的理论素养，还十分重视引导学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、观点、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，提出并形成了许多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观点和经验总结，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学校不仅是干部培养的摇篮，也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。为帮助学员和广大干部提高理论水平，1933年4月，中共中央局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为基础，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，旨在“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，在思想上为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总路线而斗争”，先后翻印或出版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研究提纲（第一种）》、《中国

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》（张闻天著）等，培养了一批理论研究人才。此外，在紧张动荡的战争形势下，学校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，认真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，在战争实践中探索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。毛泽东亲授苏维埃运动史，摆事实讲道理，将实践经验升华为革命理论，为党和红军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。组织编写《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》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》等教材，将土地革命、经济政策等实践成果凝练为可推广的工作方法，成为干部训练的重要读本。

学校鼓励学员以解决问题为导向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，深入基层、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，倾听群众呼声，反映群众意愿。毛泽东率先垂范，通过长冈乡调查、才溪乡调查，总结两个乡苏维埃工作经验，撰写了《乡苏怎样工作？》。学员针对当时苏区建设中的土地、经济、社会等问题深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，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制定正确的政策提出对策建议。1933年七八月间，首期高级干部训练班学员在会昌、门岭、武平等地实习期间，发现田雁、河口、桃溪3个村庄有35%的缺粮户，随即向当地区委提出建议，并联名形成专题报告呈交县委。县委对此高度重视，积极推动问题有效解决。

为党育才、为党献策，是党校不同于一般学校的独特价值所在。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到新时代各级党校，党校初心跨越时空、历久弥新，极大地振奋了党校人的精气神。新时代新征程，要始终如一坚守党校初心，更加自觉践行党校初心，传承党校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，把握“为党”根本，彰显“育才”“献策”独特价值，自觉在党的新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精准定位，把党校初心贯穿党校工作全过程各方面。

红色记忆



今年春节过后，一次偶然的机

会，我来到了陕北榆林的万镇。这里地处晋陕大峡谷的一侧，紧挨着黄河。我们驾车沿着黄河畔行进，可以看到开阔的河谷，黄河流经此处时河面

舒展而平缓。由于时值冬末，大块融化的冰凌不时漂过，虽然水流并不湍急，但也蔚为壮观。在万镇稍作停留，当地的朋友就带着我们继续出发，车由山路转入沿黄公路不久，就到达此行的目的地——一家当地的红枣生产加工基地。

这个基地距离市区很远，山路崎岖，似乎不利于商业推广，那么它为什么要在此选址？最重要的原因是这里产优质的红枣。家乡的老人们常说：“听得见黄河水声的枣才是好枣。”黄河木枣，又被称为“黄河母枣”，属于红枣中的珍品，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红枣品种之一，多分布生长于黄土高原的黄河中上游。这里的土壤矿物质含量丰富，水土生态适宜，气候温润日照充足，为红枣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，促进了红枣中糖、酸等成分的积累，使得其口感酥

脆酸甜。正因如此，红枣成为黄河畔上独特的水果，红枣树也成为黄河畔上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可以说，正是母亲河的丰润水土、黄土地农人们的辛勤培育，成就了今天黄河红枣的甜美。

参观完现代化的红枣加工厂房，主人拿出了由红枣生产的两款产品款待我们，一种是经过现代工艺制造的浓缩红枣汁，味道醇厚；还有一种是古老与现代融合的跨界新品——红枣咖啡。品尝着美味的红枣咖啡，遥望着黄河边成百上千的枣树，当地的一位朋友给我们讲起了红枣的故事。

这黄河畔的红枣可不一般，还有红色记忆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，这一带曾属于神府革命根据地，被誉为“抗日前哨”，是刘志丹等革命先烈曾经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。从此地沿黄河向南数十公里，就是古城佳县，那里有一座枣园被誉为“千年枣园”，据说超过千年树龄的枣树有数十株，它们枝繁叶茂、各具神韵，堪称枣树活化石。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，解放战争期间，中共中央转战陕北，毛泽东及中央机关曾在佳县神泉堡短暂停留。当时正值红枣结果时节，有战士捡起树上熟透掉落的红枣吃，毛泽东当即提醒不能违反群众纪律，及时制止了战士的行为，还帮老乡将红枣捡起来，堆放在枣树下，留下了解放军“不吃路边枣儿”、遵守群众纪律的佳话。这件事在许多讲述陕北革命故事的书中都有记载。

黄河畔的万镇、佳县、延川等多地都是优质红枣的产区，我的家乡也离这些地方不远。吃着红枣，我的思绪不禁飞回到童年时光。在我老家的乡村里，每家每户都有几株枣树，多的甚至有几十株，遍布一片山洼。每当秋天来临，也就是农历八九月间，红枣结果成熟，打枣、拾枣的活动，对大人们来说，是农耕外的劳作；对孩子们而言，则算是欢乐的节日。打枣的那几天，家家户户扶老携幼，赶往自家的枣树下，充满收获的期待与喜悦。陕北打枣的场景，路遥在《平凡的世界》中有着生动的描述：枣树的枝杈上攀附着“像猴子似的”男人和学生娃，随着树上打枣杆的起落，“那红艳艳的枣子便像暴雨一般洒落在枯黄的草地上”。还在幼时，我就曾多次亲历那一阵又一阵“暴雨一般”纷纷落下的红枣，躲闪不及，不时会有枣子打在脑袋上。但是，没有人在意这种疼痛，大家都是一边忙着把枣儿捡到篮筐里，一边停不住地往嘴里塞，新鲜的枣子，有的半青半红，有的红里透黑，嚼在嘴里，脆生生的，甜丝丝的，往往不待回程，已经快要撑破肚皮了。

黄河畔上红枣香

在缺乏冷藏技术的年代，红枣的保鲜是一道难题。若不能很好贮存，遇上阴雨天，辛苦收回的枣子很快就会腐烂。为此，陕北人想出一种办法，就是将红枣洗净，加入适量的家常白酒，再用塑料袋密封起来，或者置入陶瓷罐中密封，如此可多保存一年半载。红枣加上白酒，似乎应该叫“酒枣”，很多地方也这么称呼，但在陕北，农人们称之为“醉枣”，一字之差，就显出了对枣子的亲昵，似乎它就是我们的家人，喝了一点酒，有了酒后微醺的神态。

若逢天气晴好，农人们也会将枣子摊开在窑畔上、场院里，让它们来一场天然的阳光浴。吸收了黄土高原的阳光，红枣便会褪去水分，皱缩起来，别看样子不好看但口感更甜，这也是它们能长期保存的秘诀。当然，对大部分人家来说，大量收回的红枣，并不是留着自己食用，而是卖出以贴补家用。于是，在打枣后的那几天，乡村里便穿梭着收枣的小贩，那些用陕北人称之为“鹿皮包”，实际上就是粗糙的编织袋装好的红枣，就被一车一车收走了。红枣的价格并不高，但每家能多得三五十元的收入，也足以让人欣慰。

若是还能剩下一些枣子，陕北人会发挥美食上的想象力，将它们与多种食物搭配，成为各种创造：大颗的红枣搭配着黄米，用蘸水的粽叶包裹，就是端午节的红枣粽子；糜子面包入煮好去核的枣泥，就成为远近闻名的陕北黄馍馍；在过年时为娃娃们蒸的白面“兔子”，红枣粒就是点缀它的眼睛；里面夹着枣泥的烤至焦黄的发面饼，必须用老面肥发酵，而香夹杂着红枣香，是大人孩子的最爱……那些与红枣有关的美味，虽然简朴，但总能勾起人们思乡的心绪。

如今，随着退耕还林、生态修复，黄土高原、黄河两岸的生态日益向好，枣树更多了，甚至还形成了枣林。我也曾踏上故乡的山坡，走近黄河畔上熟悉的枣树，然而，物是人非，儿童相见不相识，只有那红枣香，依然如故。



陶渊明，东晋著名诗人，以其高洁的品格和隐逸的生活态度闻名于世。但他并非落落寡合，而是充满温情、喜爱友朋之人。他的交友之道，既体现了魏晋名士的洒脱，又融入了自己独特的处世哲学。

寻求精神共鸣。《移居》诗中，陶渊明道出交友真谛：“闻多素心人，乐与数晨夕。”所谓“素心”，正是他追求的精神纯粹性。据《晋书》记载，陶渊明虽然不通音律，却有一张无弦琴，每当朋友聚会，他便抚琴，并笑言：“但识琴中趣，何劳弦上声。”这张无弦琴象征着他的交友观——真正的友谊不在于形式，而在于精神的共鸣。陶渊明的朋友中，既有士人显贵，又有高僧名士，也有隐逸同道，之所以能成为朋友，都是因为精神上有契合之处。颜延之是陶渊明晚年挚友，他出任始安太守时，每次路过浔阳，必去拜访陶渊明，两人“酣饮致醉”。颜延之虽官至金紫

光禄大夫，但他性格刚直，不徇流俗，“每犯权要”，精神世界中自有与陶渊明相通的地方。王僧达《祭颜光禄文》说他“服爵帝典，栖志云阿。清交素友，比景共波。气高叔夜，严方仲举”，虽出任为官身居高位，心神却常驰聘于山间云雾，喜爱结交无关功利却真诚牢靠的朋友，颇有嵇康、陈蕃的风范。或许正是这种精神境界的契合，让陶颜二人成为挚友。东晋高僧慧远也是陶渊明的友人，慧远在庐山创立白莲社，邀请陶渊明入社，遭其婉拒，但两人却因精神上的契合留下了一段佳话。相传慧远送客从不过虎溪，某日与陶渊明、道士陆修静论道，谈兴正浓，不知不觉走过虎溪，等回过神来，三人相视大笑。这便是著名的“虎溪三笑”，生动体现了他们之间的精神默契。

持守率真天性。陶渊明的交友之道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在于他的率真豁达。他不拘礼节、不卑不亢，不迎合、不强求，这种态度，让他的友谊更加纯粹。李白《山中与幽人对酌》中“我醉欲眠卿且去，明朝有意抱琴来”两句，便是化用陶渊明的典故，这一场景源自陶渊明的真实生活。友人来访，他若醉了便直接说“我要睡来了，你走吧”。在《怨诗楚调示庞主

簿邓治中》中，他向朋友描述了自己的一生：二十岁时遭遇时世动荡，三十岁上又逢妻室早丧，如今天灾频仍，生计困顿。他将自己内心的隐秘和痛苦毫无保留地向友人袒露。江州刺史王弘请陶渊明喝酒，见陶渊明没有穿鞋，让人给陶渊明买鞋却没有尺寸，于是陶渊明就抬起脚来让人直接量。从这些交往细节不难看出陶渊明的真性情，他在“真风告逝，大伪斯兴”的世俗中选择了“养真衡茅下，庶以善自名”。陶渊明的率真自然还表现为他尊重好友不同人生选择的豁达，这在《与殷晋安别》中表达的尤为明确。殷晋安就是殷景仁，是陶渊明的邻居兼好友，曾任晋安太守，后出任刘裕的太尉参军，赴任前，陶渊明作诗送别，表达自己的不舍。尤其是诗的最后四句：“良才不隐世，江湖多贱贫。脱有经过便，念来存故人。”经此一别，昔日好友一仕一隐，地位悬殊，即将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，但他仍盼望故人方便时来访。陶渊明既能持守自己的人生志向，又懂得尊重友人的不同追求，这种不将己志强加于人的豁达态度，正是其交友之道的高妙体现。

摒弃门第束缚。东晋门阀制度盛行，士族与庶民之间泾渭分明，但陶

渊明却能冲破这种世风影响，与农人、樵夫真诚相交。他在《杂诗》中写道：“落地为兄弟，何必骨肉亲。得欢当作乐，斗酒聚比邻。”诗句道出了他的交友态度——不以功名利禄论亲疏，不因门第高低分远近，只要相处欢愉，即便是田父耕夫也可相交。陶渊明归隐后，常与乡邻往来，他在田间地头与农夫共话桑麻，在自家屋舍与父老乡亲把酒言欢，或是他烹鸡漉酒，款待乡邻，以荆柴代烛，欢聚至天明；又或是乡亲携酒而来，席地畅饮，同醉林树下。他与村民的交往虽然没有文人雅趣，却充满了“过门更相呼，有酒斟酌之”的质朴温情。这种纯粹的友情，正如他在《饮酒》中描绘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不需要刻意经营，自有一种天然的契合。

